

编辑故事



只要有爱心和专业精神 一样可打造出版高地

10月8日，寒露。

收到刘东老师的节气问候后，我立刻回他：“寒露不寒，温暖送给刘老师。”他秒回：“开着空调过寒露。”“开着空调睡觉”在朋友圈中多次读到，长三角的朋友们都在问：高温要不要持续到春节？

国庆节传来不幸的消息，著名作家、评论家吴泰昌先生仙逝。在《文艺报》“编辑故事”群里，众多朋友表达了伤心之情和追念之哀。本版所有文章都是有关编辑与作者、作品的故事，而今年8月，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汪修荣的《编辑“四要”——我为吴泰昌先生“编书”》一文深情叙述他与吴老的交往细节，正是出版界、创作界与《文艺报》三者生动缘分的往事，但愿修荣的回忆给吴老带去了温暖的宽慰。

如果打开中国出版地图甚至世界出版地图，你会发现，出版发达省份、出版发达国家其实与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呈正相关。拿祖国南方、西南地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当地的出版同仁都曾发出过炫目的光彩，一度、几度甚至始终领先国内同行；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都大面积地占据了我和众多读者书柜醒目的位置。他们引领国内出版潮流的气概甚至是许多发达地区出版单位所不能企及的，刘硕良、许医农、聂震宁……这些响当当的名编，都是中国出版曾经和现在的楷模和导师。

本月我盛邀云南出版集团副总编辑赵虎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汤文辉撰文。赵总细腻地叙述20年磨一书、出版《李大钊年谱》的故事，汤总梳理该社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沈津和郑炯文两位先生的交往并因此全面构筑大社古籍文献出版高地近30年的历程。他们的故事不仅告诉我们何为耐心、何为坚韧、何为开拓、何为忠诚，更启示我们，只要有爱心和专业精神，一样可打造出版高地。

另外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不要只读他们的文，还要尽可能见他们的人：人比文更精彩。

——主持人 徐海

《李大钊年谱》：二十年磨一书

□赵虎

2021年7月，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著、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年谱（上、下册）》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我有幸争取并组织了该书的出版工作。

这部年谱从李大钊生平事迹、师友交往、诗文系年等多方面入手，系统、深入发掘原始史料，旁及其他相关材料，客观真实地记载了李大钊寻求真理、投身革命、英勇献身的一生。全书共137.5万字，内容翔实丰富，资料真实珍贵，不少资料为首次公开，对此前李大钊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考辨和梳理，为认识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成为党史研究领域绕不开的“案头书”。

缘起：始于信任的携手同行

每本书的诞生都有应运而生的际会，每位编辑亦有其与书和作者的机缘。很多人问过我，《李大钊年谱》这样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的重量级学术著作，为什么会在地处边疆的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答案要从云教社1998年底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说起，该书曾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过程中，云教社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得到编委会认可。2008年，该书主编、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时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的王学珍先生，在出版《李大钊研究论文集》时，让研究会秘书长古平老师联系上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责编之一的我，希望再度合作。云教社再次以认真态度和专业水平，赢得研究会领导和学者的一致好评。

在出版过程中，我得知北大校史馆青年学者杨琥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编撰研究会20世纪90年代三大基础性学术工程之一的《李大钊年谱长编》（后改名《李大钊年谱》），便主动请缨，希望研究会和杨老师将这一选题交由云教社出版。我的想法很朴素：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亦是思想家、理论家、学问家，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版这样一部系统梳理其生平的著作，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精神传承，都极具意义。那时我恰好在云教社北京南天竹公司编辑部工作，便经常到北大校史馆向杨老师请教问题，表达出版这一选题的诚意。经过一年多反复沟通，我的锲而不舍终于打动了杨老师，在研究会支持下，2009年12月杨老师与云教社签署了出版合同。

编撰：二十年磨一剑的力耕不辍

“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钞那计年。”作者治学著书千辛万苦，编辑守望好作品也殊为不易。正如杨老师在《李大钊年谱》序言中所言，2000年他北大博士毕业接受年谱编撰任务时，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怎样的巨大困难。彼时，李大钊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检视这些成果，他发现存在“三多三少”现象：重复成果多，原创性研究少；概念性论述多，实证研究少；政治

宣传性文章多，学术研究论著少。加之这些成果出版时间早、内容简略，李大钊生平经历、革命事迹仍有不少空白亟待填补，部分叙述多为回忆性内容，缺乏确凿史料的支撑和考证，存在可疑之处。

因此，年谱编撰中杨老师始终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基础入手，广搜史料”；二是“多方参证，考订正误”；三是“加强研究，拓展认识”。他于浩瀚卷帙中，以“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决心寻觅与李大钊相关的线索、资料，资料选取不局限于史志档案，而是结合李大钊的工作经历和革命活动，既注重收集当时报刊资料，查阅其北大朋友、同事、学生的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各种文献，更着力发掘未刊发的档案，或亲自托朋友查阅海内外相关档案，务求史料更全面、更精准。从35岁到55岁，20年间，杨老师几乎遍读关于李大钊的著作和回忆文章，仅抄记资料的笔记本就有50余本。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出版人，我们深知，好作品需时间沉淀和苦心淬炼，这份坚守在快节奏的当下显得尤为可贵。

出版：千锤百炼的匠心打磨

凡事没有捷径，打造精品更是如此，要有“十年寒窗等功成”的定力，还要有千淘万漉、吹尽黄沙的执着。

2016年初，杨老师开始陆续交稿，2019年8月完稿。为保障出版质量，我们组织了10多位优秀编辑，历时5年推进全书出版。如今，当年参与该项目的编辑，有的晋升为社领导、部门主任，有的成为单位骨干、青年学者。

在校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年谱“逐年逐月、以时为纲、以事为目”的体例要求，对照原始文章、报刊文献与档案材料，逐字逐词核对内容。但凡涉及内容删改，都与杨老师反复商榷沟通，听取意见后再回溯核查档案资料，确保不漏一条史料、不少一个字词，每一段表述都经过反复推敲，以“锱铢必较”的态度还原历史细节。其间，仅我与杨老师的往来邮件就有二三十封，电话常常一打就是十几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考虑到李大钊参与多学科建设、撰写过《史学要论》等基础性著作，我们还邀请不同学科、工作背景的专家学者多次审稿，从出版规范、学术把关等方面打磨，编辑、校对、审读十余次，真正做到千锤百炼、久久为功。

在装帧设计上，封面设计二十余次易稿，最终封面选用1924年6月李大钊在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照片作为底图，既有新文化气息又不失庄重感；护封则选用十余种耗材、打样数十次，最终选定深红色棉麻布料，烫印书名、作者名及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选用深红色既象征李大钊的赤子之心，也让整体设计显得厚重、典雅，与著作的学术分量、历史意义相契合。

回响：熠熠生辉的共同成长

2020年底，《李大钊年谱》正式出版。2021年，该书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此后，该书又获得教育部第九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赵虎

2020年中国历史学5部优秀著作等荣誉，连续18个月跻身北京大学博雅堂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成为新时代人们认识、宣传、研究李大钊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必读书。学者朱成甲、王宪明、尚小明等，以及新华网、人民网等众多媒体，均给予该书高度评价。

从2008年到2021年，组织推进《李大钊年谱》出版工作的这14年，是我出版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成长意义的14年。在北京大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国家出版基金、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出版集团等单位部门、领导及同仁们的指导、关心、扶持下，年谱得以出版并获奖，让我对出版工作有了全新且深刻的认识。此后，我又策划或统筹推出的《大象》《纽带——中老铁路纪行》《中国楷模当代篇》《民族的号角——唱响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或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物、“中国好书”，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国家民族文字专项出版资助。这些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这14年积累的经验与锻炼的能力。

回望18年前与杨琥老师第一次见面，那时他刚过40，待人谦和、性情质朴。此后多年，我们曾无数次在他的办公室和宿舍里促膝长谈。他的宿舍陈设简单，除了简易桌椅、电脑、沙发外，就是摆满书籍和资料的书架。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杨老师二十年如一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始终践行着李大钊“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的箴言，最终著成《李大钊年谱》这部填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研究空白的里程碑之作。

作为亲历者、推动者、参与者，能与好书共同成长，何其幸运！（作者系云南出版集团副总编辑）

饮其流者怀其源

——广西师大出版社与哈佛燕京图书馆两先生

□汤文辉



汤文辉

箱匆匆告辞，现在想起来颇觉汗颜，辜负了沈先生一片苦心。又如香港藏家林章松先生的印谱项目，也是沈先生亲自促成合作，但进展到一定阶段，正逢出版社遭遇变故，项目的推进和对接都出现问题，导致项目未能衔接。事后沈先生分析该项目，其文献学家的思路又令我豁然开朗。总之，究其原因，是沈先生之才如潘江陆海，我们亦步亦趋，显然跟不上，只能瞠乎其右。当然，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我个人原因。客观原因是十年前出版社遭遇了挫折，兹不赘述。个人原因是我原本主要做人文社科学术出版，2011年担任社长助理，才开始涉猎文献出版，个人储备和思想准备还不够，在应对客观环境调整时难免应对不足。

写到这里，不免又想起另一件事。2016年，出版社领导班子对业务分工做了调整，我不再分管文献分社。工作安排当然应服从，情感上却难以置之不顾，所以当时颇感踌躇。为了继续推进该领域业务，我们在北京成立了文献出版中心。当时希望邀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社长郭又凌先生、原总编辑徐蜀先生主持中心工作，两位前辈于我虽然有数面之雅，但毕竟不熟，于是求助于沈先生。沈先生隔海联络，玉成此事，又帮了大忙。

四

沈津先生是典型的文献学家，郑炯文馆长则是典型的图书馆学家。郑先生年轻时师从钱存训先生，很早就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担任馆长，其后接续吴文津先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近百年历史上的第三任馆长。基于“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以及希望馆藏资源“化身千百”服务学术的宗旨，当广西师大出版社有意开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资源，出版珍稀文献服务国内学术界时，他当即拍板决策，其魄力和图书馆学家的职业精神令人敬佩。遥想三十年前，作为地方大学出版社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地处边远，国内了解尚且不多，遑论海外？设想：如果换一家馆藏机构，特别是国内机构，在三十年前，面临一家地方小社提出的合作请求，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你们是谁？你们具备这个能力吗？而郑馆长能很快做出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合作的决策，这种魄力令人惊叹。

五

郑馆长决策很快，也很“程式化”，自从合作开始后，广西师大出版社每年都会拜访哈佛燕京图书馆，向郑馆长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并提出新项目的设想。对于新的项目，郑馆长会认真听取出版社的想法，并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也有严格的要求。

合作既久，郑馆长对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工作比较满意，他也有意与我们长期合作，这是莫大的荣誉和鼓励。郑馆长对这个边远小社的肯定，按我的理解，既出于对后进的提携青睐，也是对出版社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精神的充分肯定。2019年，我们在桂林召开了首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研讨会”，郑馆长在讲话中回忆说：“他们来到哈佛（洽谈合作），往往住得很远，他们不了解城市的风景点，但对波士顿的地铁很熟悉……”因为便宜的酒店都远，打车太贵，所以我们坐地铁。波士顿的地铁系统的确有点复杂，红橙绿蓝银，倒地铁需要反复确认。郑馆长的嘉许饱含情感，而我们的合作也成绩斐然。截至郑馆长荣休，广西师大出版社已出版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9种、学术丛刊6种、文献丛刊23种，超过千册。

六

庾信有辞曰：“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庾信文章老更成，成于其情感之沉郁深厚。感恩之心，无时无刻，本乎人性；沈津先生、郑炯文先生足为楷模，不仅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卓越的成就，更在于他们作为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源泉满怀感恩之心。而机构、企业也应当如此，广西师大出版社见贤思齐，从他们这里得到言传身教，从很多师友处学习到立身处世的原则，因此更应怀其源流。唯有志其所来，方能知其所往；唯有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才能行稳致远。近日回顾往事，感慨系之，因结构成文，遥寄《浣溪沙》：

定策美洲洲载前，钩深致远汇芸编。谁为广结绿缘？千百化身尊学术，独承青眼感前贤。饮其流者志其源。（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广西师大出版社不是古籍类的专业出版社，而发展出专门的文献出版板块，尤以海外文献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等为特色，得益于专家支持者众多，特别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两位先生：沈津和郑炯文。

1986年成立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像那个时代很多的兄弟社一样，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积极进取，努力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教育出版领域已有一定的成绩，但广西师大出版人没有满足于现状，基于对出版宗旨的理解、追求和人文情怀的底色，在已有的基础上，广西师大出版社有意在学术出版、大众出版领域发展。在时任社长肖启明先生的支持下，文献板块是努力尝试的一个重要方向。1998年，出版社何总编辑同两位出版界同仁一起，拜访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在沈先生家中，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中华文献广泛流布海外，本身是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体现。沈津先生早年师从顾廷龙先生，得老一辈学者之亲炙；其后又到海外，是少有的集深厚学养和广博视野于一身的文献大家。沈先生深具世界眼光，故念兹在兹的，是这些在海外的中华文化瑰宝，如何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利用。而广西师大出版社作为地方出版社，地处偏远，在人才队伍、出版资源等方面均有所不足，正思考如何避开短板、开拓新领域。这次会面不意中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海外中华文献出版展开了一张路线图。

二

其后，在沈先生的安排下，何总编辑分别拜会了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和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鲍弼德教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工作人员第二次来波士顿的时候，合作关系就大体确定了。而沈先生的工作，还不仅是指出发展方向，同时也确定了学术标杆。

沈先生在2024年时曾回忆当时的考虑：首先编列一套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珍稀的古籍丛刊。他从哈佛燕京图书馆1500种明代刻本中挑选，其标准有两条：“第一是只有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其他图书馆都没有的；第二是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以此为标准，丛刊最后选定珍稀古籍67种，沈先生用了两个月时间为每种古籍撰写书志。2003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一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全37册）出版，并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此后，沈先生领衔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6册400万字）于2011年出版，获得出版领域国家最高荣誉：中国出版政府奖。

有了这样的良好开局和学术标杆，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其经营中，逐渐形成了“珍稀文献”的自觉意识和品牌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几点：一是所选文献应该是稀见稀有，二是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传承价值，三是通过适当整理服务学术研究。

三

沈先生不仅是在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珍稀古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海内外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整合学术资源、出版资源。比如北美其他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他要么鼓励、介绍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开展合作，要么告诉我们哪些馆哪些资源有价值。又如在国内，他不遗余力帮助广西师大出版社与收藏大家如王贵忱先生、韦力先生、林章松先生等牵线搭桥，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写到这里，几件没有落实成功的例子马上浮现脑海，如某次沈先生安排我同上海收藏家王德先生会面，本意是让我见识一下王先生的收藏，并可看看出版方面如何合作。我那次也不知是脑袋缺了哪根弦，将另外一件事情的时间安排得很近，结果是还没来得及看藏品，就拖着行李